

ZUOZHUAN YU
CHUNQIU SHIDAI
DE WEN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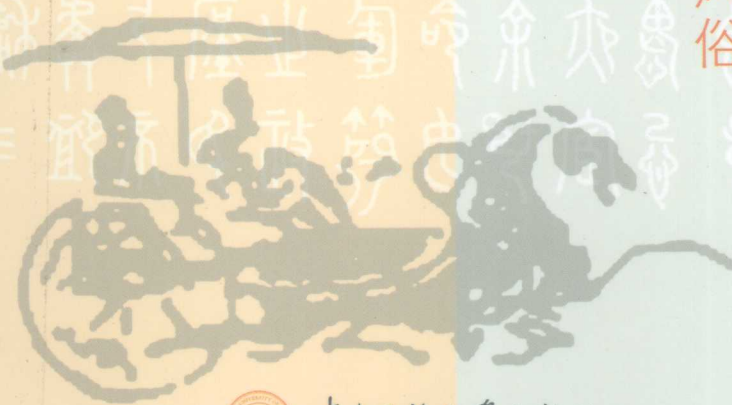
● 黄 鸣 / 著

左传与

——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

春秋时代的

文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

——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

黄 鸣/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黄鸣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8

ISBN 978 - 7 - 81108 - 729 - 1

I. 左… II. 黄… III. ①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春秋时代②左传 - 研究 IV. I206. 2 K225.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309 号

《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

作 者 黄 鸣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李 海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729 - 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蒋 凡

中国士人富有浓厚的历史意识，所以古有“六经皆史”之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诞生之始，就和巫史所代表的史官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后人轻视巫史，认为巫医百工之人不齿于士人，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就持这种态度。但在先秦上古社会，巫史地位很高，是当时进入国家决策的四种人（按：指君主、卿士、庶民、巫史）之一，事载《尚书·洪范》篇。可见当时的巫史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与后世跳大神扶箕念咒的巫婆神汉大不相同。古代历史，君主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见班固《汉书·艺文志》），言议与事功分开记述，如果言而无序，叙而不法，则“后嗣何观”？正如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以资后世借鉴。后来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正取此义。而《左传》作为先秦时期最优秀的文化典籍之一，正是当时史官文化的结晶。

孔子以前，“学在王官”，史官著述展现了上古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但在孔子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学术下移，故孔子开民间私人办学新风，开始了私人讲学著述。有关《左传》的作者，是否如司马迁所说是左丘明，唐宋后颇有争论，至今尚无定谳，在此暂不讨论。但《左传》作者继孔子《春秋》而作，而孔子则是参阅当时鲁国史官的《春秋》而作，是对史官历史著述的继承和发展，则是毫无疑义的。《左传》作者如果不是广泛参阅王官的史述著作，又怎能写成《左传》洋洋十几万言的巨著呢？《左传》作者是否是史官？史无明言，但

他继孔子《春秋》而作《左传》，承上启下，既是对以前史官文化的总结，同时又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个人著述与百家争鸣的大门。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特别是研究先秦学术，那么《左传》一定是必备之书，不读《左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先秦的历史与学术。

读黄鸣的《〈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所受启迪颇多。不仅在文学方面，举凡历史、哲学、军事、法律、政治、经济，甚至是当时的“国际”（按：指当时诸侯国）外交，以及民族习尚、民风民俗、神话传说，作者都探幽索微，深入研讨而自具机杼。作者明确指出：“对于春秋时代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貌进行整体研究和分析，从而为它进行分期、分域、分派的论著，至今尚未出现。”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空白，于是作者“努力从事科际整合，将《左传》文学研究构建在一个整体的、有机的、协调的、适用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之上；强调文学中人的价值，剖析春秋时代列国民族风俗中人与地域的关系，以及《左传》对它的文学形式的反映”。从上古巫史沟通天人从而代天传言的“天命”观，发展到《左传》中实现人的理性精神的展现，完整地构建了上古时期的文学精神。针对春秋学术的历史实际，作者对《左传》及其文学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总体研究，简要言之，体现了以下三个“不分家”的特点：一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跨学科研究，这是先秦“文学”范畴的特定含义所决定的。读其书，读者自能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今人研读中国古代文学，常是借助近代西方文学之义来衡量，仅就文学论文学，这样的研究与批评，常常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而违背历史实际，其误人子弟，也在意料之中。二者相较，优劣自见。二是文学与语言文字研究不分家。今日之中文系，不仅机械割裂语言与文学的专业诉求，还进一步机械分割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必然联系。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许多古代学术研究就离开历史实际越来越远。有鉴于此，作者从文学是语言

的艺术这一本质特性出发，对《左传》的文学研究绝不脱离当时的语言文字实际，并且不畏艰难，特别列出专章专节，对上古汉语中的甲骨文和金文的语言叙事功能进行剖析透视，进一步把上古汉语的历史发展与《尚书》、《诗经》、《左传》的语言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把语言是文学的载体的本质阐述得很清楚。比如，把西周金文的《多友鼎》与商代记述征伐的甲骨文相比，得出“《多友鼎》对战争过程的记述和对战争细节的描写明显要超过商代的甲骨文。这是时代进步使然，也是金文叙事能力有所提高的表现”的结论，所论甚是，颇具说服力。三是文学与艺术不分家。先秦的典章礼制，诗、乐、舞三者合一，这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当时的文学与艺术诸多形态，实际上很难分家。这就要求《左传》文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先秦礼、乐典制及民风民俗的知识，而且还要对乐、舞诸艺术领域有所了解。在这方面，作者也作出了努力，其论著中设有“雅乐与俗乐——青铜乐器与音乐世俗精神的普遍化”专节，论证了当时音乐艺术由娱乐化向娱乐化、审美化的发展，以及后来儒家乐论的反思与回应，无不娓娓道来而启人深思。研究《左传》及其文学，要实现上述三个“不分家”，并非易事，但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初步完成了自己的学术构建，其谨严的治学态度的确难能可贵，值得提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传对经的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问题。作者曾说过，“历史需要守夜人，但更需要开拓者”。《左传》既是《春秋》的守夜人，同时又是优秀的“开拓者”。读此书的有关论述，值得品味。《左传》古时又称《春秋左氏》或《春秋左氏传》，按照经学家的说法，原是配合孔子《春秋》而作。圣人所作《春秋》为经，而《左传》为之疏解称传。但实际上，《左传》其书，大大丰富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内容，早已逸出了注解疏释之“传”的范围，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春秋经》，因而其学术贡献和文学成就都很大。汉朝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当时文人士

者士大夫议论之时无不“依经立义”。在这种崇圣尊经的气氛中，桓谭就《春秋》经传关系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说：“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论·正经》）孔子是圣人，其作《春秋》，号称是“笔则笔，削则削”，七十子之徒不能置一词；孔子自己也因此自负，说是“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后人誉《春秋》为“一字褒贬”，似乎处处都寓有微言大义，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但若以今人眼光视之，《春秋》过分简略，只能说是孔子给学生讲课时的历史教学大纲，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所以还不能称为写作提纲。如果没有后来的《春秋》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人们只读《春秋》，又有谁能明白春秋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呢？以此，宋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言辞虽然偏激，对孔子作《春秋》的开拓贡献估计不足，但却道出了某种学术真相。据说孔子作史，建立自己的一套“春秋笔法”。《左传》作者对孔子《春秋》“笔法”或“义法”当然有所继承；但在写作过程中，到了该突破圣人藩篱之时，《左传》又会大胆地放开手脚，另行创新而自我作法，所求是合乎实际，而非惟圣人之马首是瞻。从思想立场来看，孔子讨厌战争，自称是“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又坚决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论语·季氏》）。后来儒家“亚圣”孟子也一再斥责“春秋无义战”，认为“善战”者应服上刑（《孟子·尽心下》）。《左传》作者也属儒家，但他对战争的态度却不尽同于圣人。《左传》对于战争津津乐道，记叙了大、小近五百场战争，特别是对春秋五霸无论是齐桓、晋文、楚庄或秦穆公等发动的战争，更是详加叙述，描绘具体生动，可说很有兴味而又不厌其烦，充满了同情之理解。为什么会有此不同？因为从历史家的眼光来看，礼崩乐坏时诸侯、大夫甚至是陪臣执国政是历史的现实，“春秋无义战”曾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杠

杆。《左传》作者虽和圣人一样提倡仁、义、礼、法，但因所处时代的不同，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历史家的视野，必须注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更加讲究历史的客观实际，这是既发展了儒家思想，同时又不囿于圣人的创新意识。而思想的创新又进一步引发了学术和文艺的创新。比如《春秋》作为引起记忆的授课提纲，当然非常简略，记事尚有不足，更何况是写人呢？《左传》则不然，作者打破了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言、事分开的传统，另创“言事相兼”的新法。如清刘熙载《艺概》所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其叙事重点，已逐渐从客观记事转向了以写人为主，把历史的主人公描绘得声口毕肖，栩栩如生，既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又让人读来饶有兴味而一见难忘，特别是人物的内在心理描写，更是曲尽其妙，令人叹为观止。而即使是记言，作者也不忘以写人为中心的形象展现。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从政一年，與人（按：即众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当子产执政之时，在郑国实行了某些政治经济的变革，虽曾触动了某些旧贵族的利益而引发怨谤之言，但他坚持改革而不为所动，终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利益。在这里，“與人”之言，纯是言论而并非叙事，并未正面写子产其人，但是通过第三者的言谈，及其政治态度的前后变化对比，子产的历史功绩突显了出来，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左传》是历史著作，但却写活了无数的历史人物，让千秋万代的后人永远难忘，于是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画卷，就承载着活生生的人物活动，波澜壮阔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指出，《左传》写作是“不遵古法”，是一种创新，因而《左传》艺术笔墨“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刘氏点明了《左传》叙述笔墨是学术性

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特点。

要研究《左传》，并非易事，作者识见必须会通古今，学贯中西，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深厚的学术功底。黄鸣的著作，的确尽了自己的努力。他对乾嘉学者的“实证”功夫及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运用颇为熟练，因而重在言必征信，以证据服人。其所著虽然偏重文学方面，可作为简明的春秋文学史来读；但作者进一步就文学而加以扩展，进行了整体综合研究，“兼顾描写、比较与解释，深入到文本所反映的时代本身的不同文化层面”，因此，在作者把文学与史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诸多相关学科进行整合比较研究之后，其著作通过明白晓畅的概括，实可作为春秋简史来读，无论是对初学者或研究者，一定都大有帮助。不仅如此，作者的文字富于理论思辨眼光，透过历史事实，来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相及本质。比如，分析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他既看到人类精神的自省，更深入一层地指出了古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流动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促使人类进一步地去认识自身”。在春秋的历史舞台上，“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方国，从方国到共主，从天子到侯霸，种种政治行政的表层之下，种种体国经野之道的外衣下，涌动的是农民与牧人、织妇与工匠、猎手与渔夫们忙碌的身影。教化刑政，均从此而出”，深刻地揭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活动与春秋礼乐文明的本质联系。的确，如果没有人民的创造，又哪来的千古文明呢？

一隅之见，用以代序，未知当否，就正于方家与广大读者。

2009年4月8日

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本书论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左传》文学研究概述	(3)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结构要点	(19)
第二章 春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形成(上)	(20)
第一节 上古汉语	(21)
一、甲骨文	(21)
二、金文	(26)
三、《尚书》与《诗经》	(29)
四、《左传》	(33)
第二节 创作者	(36)
一、王公贵族	(36)
二、下层官员	(37)
三、底层民众	(42)
第三章 春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形成(下)	(51)
第一节 历史理性在春秋时代的强化	(52)
一、从卜官到史官转变过程中《易》的关键作用	(56)
二、军职之史与记事之史的并行系统	(61)
三、春秋时代历史理性的强化	(82)
第二节 雅乐与俗乐	(87)
一、问题的提出与铭文中的相关线索	(87)

二、西周时代乐器铭文中的娱神论与娱乐论	(89)
三、春秋战国时代乐器铭文的世俗精神	(95)
四、冲击与回应:儒家乐论的选择	(100)
第四章 春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分期	(104)
第一节 沉潜期的文学与文学活动概述	(109)
一、隐公时代(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2年)	(109)
二、桓公时代(公元前711年—公元前694年)	(111)
三、庄公、闵公时代(公元前693年—公元前660年)	(114)
第二节 发展期的文学与文学活动概述	(118)
一、僖公时代(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	(118)
二、文公时代(公元前626年—公元前609年)	(122)
三、宣公时代(公元前608年—公元前591年)	(127)
四、成公时代(公元前590年—公元前573年)	(130)
第三节 繁荣期的文学与文学活动概述	(134)
一、襄公时代(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42年)	(134)
二、昭公时代(公元前541年—公元前510年)	(143)
三、定公时代(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	(152)
四、哀公时代(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67年)	(155)
第五章 春秋时代文学的地域分野与列国民族风俗(上)	(159)
第一节 春秋时代政治与自然地理概况	(160)
第二节 春秋时代文学的三大地理板块	(165)
第三节 齐鲁派的文学与文学活动	(170)
一、齐国的地理、风俗与文学	(172)
二、鲁国的地理、风俗与文学	(196)
三、齐鲁派的文学作者与文学活动	(207)
四、齐鲁派的文学风格	(209)

第六章 春秋时代文学的地域分野与列国民族民俗(下)	
.....	(219)
第一节 晋郑派的文学与文学活动	(219)
一、晋国的地理、风俗与文学	(220)
二、郑国的地理、风俗与文学	(229)
三、晋郑派的文学作者与文学活动	(246)
四、晋郑派的文学风格	(247)
第二节 秦楚派的文学与文学活动	(255)
一、秦国的地理、风俗与文学	(255)
二、楚国的地理、风俗与文学	(268)
三、秦楚派的文学作者与文学活动	(275)
四、秦楚派的文学风格	(276)
第七章 总结	(283)
附录:《左传》引先秦古佚书考	(291)
参考文献	(324)
后记	(338)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本书论题的提出

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学史的“黎明期”。对这一时代的文学，前人的研究多从具体的专书入手，如《诗经》，如《论语》，由此形成一种专题专书式的写作范式。不但通史性的写作如此，^①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有一定断代史性质的《先秦文学史》也都是如此。如民国时代柳存仁先生所著的《上古秦汉文学史》，以第四章“春秋战国时期”来统摄此时代的文学，而叙述上仍然采取专书分叙方式；徐北文先生的《先秦文学史》，以《诗经》和散文两节来分述春秋时代的文学；张志岳先生的《先秦文学简史》，亦以《诗经》与历史、诸子散文来叙述春秋时代文学；褚斌杰与谭家健先生主编的《先秦文学史》，也是以对《诗经》和历史、诸子散文的描写来勾勒春秋时代的文学面貌。^②而对于春秋时代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貌进行整体研究和分析，从而为

① 如在目前最为广泛使用的古代文学通史性教材、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一编“先秦文学”中，对春秋时代的文学仍是以“《诗经》”、“先秦叙事散文”、“先秦说理散文”等章节，与战国时代一起叙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0—128页。

② 参见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收入《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徐北文：《先秦文学史》，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张志岳：《先秦文学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它进行分期、分域、分派的论著，至今尚未出现。这正是本书想解决的问题。

《左传》是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研究春秋时代的文学分期、分域、分国诸问题，不研究《左传》则无从着手。《左传》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尽管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以及不同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它的产生时代都有所争议，但现代学者基本上可以给出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即《左传》的主体产生于先秦时代，具体说来，可能是战国前期。^① 它记述了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状况。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文学、政治、哲学、法律、邦交、军事等问题，不可能离开《左传》，正如东汉桓谭所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②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高度评价《左传》：

支那学家用来研究古代中国的各种文件，没有一种比《左传》更重要。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成熟时期的主要史料。在《左传》里，我们有西历前七二二年到四六八年的时期中的详细记载，组织很巧妙，文字很有力。要解释各种古代的文件，我们必须依赖《左传》中的掌故和史迹，沙畹（Chavannes）解释汉代雕刻品时，他常用此书里的掌故。别的古书里所有礼节和宗教观念之系统的描写，可以在《左传》里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对于语言学者，此书也很重要，因为是个范围很大的文件，里边用词极丰富而复杂，文章极有力

① 如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认为在公元前351年以前成书，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38—116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认为在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89年之间成书，见《春秋左传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41页。

② 《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46页。

而美妙。总之,《左传》是中国文学的杰作之一,为中国人所爱读爱研究的。^①

《左传》是一部跨专业的典籍,举凡历史、哲学、军事、法律、政治、国际关系诸领域的学者均有涉足。如果对它的各个侧面没有足够了解,就难免有“见山而不见林”之弊。本书将努力从事科际整合,将《左传》文学研究构建在一个整体的、有机的、协调的、适用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之上;再者,本书强调文学中人的价值,剖析春秋时代列国民族风俗中人与地域的关系,以及《左传》对它的文学形式的反映。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1)通过《左传》所记载的史实,比较系统地研究春秋时代中国文学的演进程度,在此基础上对春秋时代文学的成立与分期进行研究;(2)通过对《左传》及其他典籍反映出来的春秋时代的民族风俗与文学的基本面貌研究,为此时代的文学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在此基础上对春秋时代文学的分域与分派进行研究。

第二节 《左传》文学研究概述

一、古代

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云:“《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②此言立足于三传各自的整体风貌立论,可以称得上是对

^① [瑞典]高本汉:《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上海:新月书店,1927年,第1页。

^② [清]钟文丞:《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范氏元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页。

《左传》文学特征的最早点评。

《左传》的文学研究，始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他的研究特点是：把《左传》放在史学叙事的视角下进行研究，所得结论为他对史学叙事特征的梳理而服务，故其评论，多杂见于书内各篇之中。如《载言》曰：“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①此言《左传》兼备记言与记事的特征。《模拟》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顰，弥益其丑。”^②此言《左传》在史传叙事著作中的地位。刘氏比较完整的评述见于外篇《杂说》，其说曰：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筹策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谄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凜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腹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惟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③

刘知几从《左传》的叙事内容、文字风格、才思造詣、与

① [唐]刘知几：《史通·载言》，[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页。

② [唐]刘知几：《史通·载言》，[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2页。

③ [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1页。

《公羊》、《穀梁》二传的比较等几方面来说明《左传》的叙事成就，实际上是一篇史学家眼中的《左传》史传文学特征的概括性纲领。

唐韩愈《进学解》曰：“《春秋》谨严，《左氏》浮誇。”^①韩愈以《左传》为浮誇，其着眼点在于它的文辞富赡；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记载为文次第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②《左传》、《国语》（柳宗元亦认为《国语》为左丘明所作）、《庄子》、《离骚》，其共同点是文学色彩浓厚，柳宗元将其归于一类，亦着眼于其文辞富丽的特质。

五代、宋之后，文学之风大盛，对原本作为经典的《左传》，开始有人从文章学的角度入手整理或研究。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九》录《左氏传引帖新义》一书，下云：“《崇文总目》：伪蜀进士蹇遵品撰，拟唐礼部试进士帖经旧式，覈经具对。”^③清钱东垣辑本《崇文总目》卷一录此书为《左氏传引帖断义》十卷，钱氏按曰：“《通考》‘断义’作‘新义’，旧本‘帖’讹为‘古’，今校正。”^④蹇遵品为五代后蜀进士，据书下说明可知，蹇遵品是把《左传》作为进士考试时帖经议论的材料，具有范文的性质，可能近于南宋吕祖谦《左氏博议》。此书已佚。

①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6页。

②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第547页。

③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九》，卷一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3年，第1569页。

④ [宋]王尧臣、欧阳修等著，[清]钱东垣辑：《崇文总目》卷一，《粤雅堂丛书》本。